2010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山西革命根据地
作家类型生成研究

徐慧琴　主编

★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历史成因
★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文学范式
★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历史影响
★ 文艺活动大事记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历

徐慧琴，1月12日，英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跟随集总三个月，由晋返汉口称：山西全省人民均在对日作战。并评述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2月中旬，朱德、彭德怀、左权、康克清、丁玲等，在临汾刘村八路军办事处接待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

第一二〇师民运部、晋西北农救会等单位联合出版《西北战线》间日刊，编辑人员有：刘柯、吉哲、绕斌、卢梦等，共发行一120余期停刊。

10月，晋东南根据地第三行政区行政公署（设在沁县南沟），由在各部门担任工作的爱好文艺的干部筹办了根据地最早的文艺刊物《文化哨》（月刊），在沁县南沟出版。《文化哨》油印本，共出8期，由王玉堂、郝汀等编辑；发行数初为700份，后增至1800份。出刊3期后成立编委会，由郝汀、王玉堂、王振华、陈大东、王书良、周化南等任编委。

11月，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吕梁抗战剧团。这个剧团是由施凌散（施林杉）同志等几个爱好戏剧歌咏的同志发起组织的。
殷参在1940年1月5日的《文化前锋月刊》上发表。

2010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研究

徐慧琴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革命根据地
作家类型生成研究

2010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乡村文学与文化研究”（晋教财2011.118号）的资助

太原师范学院青年学术带头人经费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历史成因 …… 1
一、山西革命根据地地域文化因缘 …… 1
二、山西革命根据地政治历史语境 …… 5
三、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学思潮演进 …… 9
四、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学创作实绩 …… 19
第二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30
一、以革命者的名义进入根据地的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31
二、对革命的向往而进入根据地的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40
三、在根据地短期逗留的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44
四、根据地培养成长起来的作家类型生成的形态构成 …… 53
第三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文学范式 …… 71
一、意识形态与经典制作 …… 71
二、题材取向与表现对象 …… 106
三、话语方式与叙事张力 …… 150
四、风格范式与审美抉择 …… 1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历史影响 …… 180
一、根据地作家类型影响共和国作家的身份意识、文化性格、文艺观念 …… 180
二、根据地作家类型创作影响共和国文学的发展路向和兴衰消长 …… 187

附录　文艺活动大事记 …… 206

第一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作家类型生成的历史成因

一、 山西革命根据地地域文化因缘

从地理环境看，山西形似一片长叶的15万平方公里疆域，位居黄土高原东部，紧倚黄河中游，崇山峻岭，地形险要，关隘重重，山多川少，黄河、长城、太行山、五台山、盐湖、云冈、古战场……分布全境，历来被称为“表里河山”、“山川伟固”。独特而险峻的地形，使它从古代到现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战场遗迹。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再加上频仍的战乱，又使这里的民众形成了坚韧、质朴、务实的地域性格和节俭、精细的民风。从文明发展讲，山西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直根”，其历史可以上溯到炎帝、黄帝及至尧、舜、禹，农业文明与封建文化根深蒂固，被一些学者称为“五千年历史在山西”。文明煌煌，绵延不绝。从文化传统上说，以法家文化为主体，名家和纵横家为侧翼，再加上儒家和道家乃至佛家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强化，构成了三晋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体系。三晋文化历经百年来的政治激荡、文化冲突、世事沧桑，已然几经蜕变，走向式微，但它作为一种源于历史、文明、土地的精魂，并没有彻底瓦解和消失。它生生不息，积淀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里，流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性格心理中，依然潜在地影响着山西社会和山西人，更直接

地影响着山西文学的兴衰和流变。

文学总是深深植根于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形成了自己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它是一个地区整个文化精神的形象而具体的展示。同时，它又把自己融入文化发展中，丰富和扩展着这个地区的文化内容和风貌。正如董国炎所说：“质朴厚重是山西文学的基本特色。它作为一条主线，起伏显现，能够贯穿整个山西文学史。质朴更多体现在形式方面，厚重，更多体现在内容方面。”[①]在表现内容上，山西作家更注重较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当下的农村生活和风俗民情，人物形象也多取材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底层农民。思想视角也往往是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饱含着一种深切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创作上更擅长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着力于故事情节的铺陈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山西作家更青睐的是讲故事的叙事模式，环环相扣、严谨有序的结构营造，朴素而明朗的白话语言等等，这是秉承了山西一代又一代作家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追求的突出表现。

抗战初期，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创建山区根据地的经验，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形条件。在制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时，提出依托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并解释从山地向平原发展，是指首先在山地建立根据地的发展顺序。1937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②]根据这一原则，八路军首先在华北数省中地势最高山脉最多的山西展开。从而控制了山西高原的主要山脉，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并利用这些山地，居高临下，虎视华北平原的优越条件，依靠山西有利的政治形势，良好的群众基础，比较充裕的物质条件，建立革命根据地。

追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震撼波及了全国各地。远离五四文学革命中心的山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高君宇、石评梅、高长虹等有识之士，都是那时的觉醒者。但从总体上看，他们长期远离本土，跻身于异域文化园地，对于山西文学势必缺少一种较为直接的作用与影响。因此，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快，而山西文学即使到了30年代，仍然处于封闭状态。鲁迅先生1933年说山西还处于被“开垦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山西离北京文化中心不远，文化振荡却动摇不了它的核心观念呢？那是因为“山”的原因。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西邻黄河，却被大山环绕。东太行，西吕梁，北恒山，南中条，都说的是这种山山阻隔现象。这片黄土覆盖的丘陵地带，常年水土流失，加上受断层影响，大部分地区沟壑无数，岭谷交错，地貌险峻。境内娘子关、雁门关、平型关等内长城遗留的关隘险道，更使山西处于复杂的地理位置。险峻的地理环境，一如上面分析根据地建立的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是非常有利的，但对于山西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交通商业、教育文化等却极为不利。大山的阻隔，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心理结构、人文精神，而且，人们长期地与外界隔绝形成了封闭式的群体意识和山地性格：质朴憨厚，崇尚中庸，注重实际，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由大山造成的“围城”，不仅限制和囿困了人们的生存意识、生活方式、审美视野和民情民俗，而且迟滞了山西的整个发展，包括观念的简单陈旧和文学艺术的保守落后。

在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和军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下，山西人最理想的人生观、土地观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淡泊平和、自由自在、生生不息地沿袭一种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生存方式、“安天乐命”更将一种从不抗争的奴性山人文化心理涵盖。

山西成了抗日的前哨后，尽管当时的山西人依然没有走出原有生活规范和

思维结构，但敌军压境的严酷现实，不仅对普通人震动异常，就连统治者阎锡山，也不得不考虑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突破固有思维定势，宣传革命，提倡变革。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全国的许多著名作家纷纷云集山西革命根据地，抗日救亡，建设解放区，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那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在根据地逗留时间有的很短，有的只是匆匆而过，有的则在山西“扎根落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在山西这块炽热的、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开展革命斗争，从事文学创作，宣传文艺主张，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有着开阔的文化、文学视野，有着较高的审美思想和境界，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在战争实践和同工农兵大众的结合中，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升华，也使他们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和飞跃。外来作家的创作成果，如一股清新、强劲的春风吹进山西革命根据地，深刻地影响和丰富了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学创作，有力推动了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对相对封闭、落后的山西文学的一次大碰撞、大开放，是对山西本土作家的一次大冲击、大提高。

注释：

①董国炎：《山西文学大系·导论》第1卷，3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二、山西革命根据地政治历史语境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创造。始创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就其表象而言，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存在时间长。从1937年10月至1949年9月，历时12年，期间不仅没有间断，而且坚持到全省完全解放和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二是占全省面积大，遍布全省各区。按2000年的行政区划，118个县（市、区）中，109个县（市、区）为根据地，占92%；1882个乡中，1520个乡为老区，占80%。

（一）山西革命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挥中心在陕北。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直接对日作战，必须有一个战略支点，作为党和军队赖以生存、发展的战略依托地。这个战略支点，必须有利于插入日军进犯的战略要地，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利于推动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独立自主提供兵源、给养，有利于向华北各战略区出击，开辟整个华北敌后战场。作为“五有利”条件的战略支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将其选择在山西。毛泽东在1937年9月17日发往山西前线的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周恩来在1937年9月，从山西前线致电中共中央，分析山西的战略地位，提出山西应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

而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有自身有利的条件：其一，从日军侵华的部署和进攻的态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面对日军的侵犯，华北的国民党军队70余万人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政府和军队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猛烈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局。依据上述战争态势，毛泽东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把数量极为有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山西这个战争热点地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抗击敌人。

其二，从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政治态度看。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1937年7月下旬，阎锡山向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彭雪枫透露南京方面企图借日军之手歼击红军的计划，并建议红军在五台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答应红军入晋后补充枪支弹药和其他供给。实际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中共和阎锡山已建立抗日共同战线。八路军三个师入晋得到阎锡山的多方合作与支持。这亦是创建战略支点绝对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

其三，从共产党在山西的工作基础看。中共中央依据战局的发展，把党与八路军的主要力量放在山西，形成创建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领导核心和后盾。中共中央派往山西的力量有如下四支：一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书记先后为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北方局委员先后有彭真、朱瑞、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罗瑞卿、滕代远等。北方局选派干部到山西，组建五个省委，分别为晋西南、晋西北、晋察冀和中共山西省公开工委展开工作。二是八路军总部和下属三个师。包括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还有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三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937年9月5日，周恩来来到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各事，直到11月25日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工作82天之久。四是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副主任曹言行。《毛泽东军事文选》收录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电文66篇，其中发往山西前线的有61篇。

党与八路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四面包围日军的态势。在创建4个抗日根据地初期，党组织与八路军发动群众，实行合理负担，收编国民党溃

军，组织抗日游击队，阻击日军进犯。同时。积极发展党员，组建县、区、村中央组织，改造地方政府，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5月，4个根据地内有4个省委、20个特委、100多个县委、党员两万余人。与党委相对应，组建抗日政府和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全省组织起来的民众约300万人。八路军扩展到10万余人，新军7万余人。抗日军民多次打退了日军的多路围攻，巩固了4个根据地。

（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西革命根据地以极大的精力、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山西境外作战，包括支援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进军中原战场，支援平津战役，直到最后支援解放大西北、大西南及中南地区。山西革命根据地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一，作为向外扩展的基地。1945年8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3个团和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太行区委派出62名东北籍干部，400余名朝鲜义勇军指战员，6个分区和6个团的干部开赴东北。1946年11月起，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晋绥军区先后调出3个纵队由晋西北开赴陕北，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战斗。1947年6月，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军队向山东、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外线作战，调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入国民党统治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其二，作为兵源补充的基地。几次向外扩展，山西战场调出正规部队30余万人。山西革命根据地一次次掀起参军热潮，晋绥根据地3次扩兵9.67万余人，太行根据地两次扩兵14.43万余人，太岳根据地3次扩兵7万余人，晋东北20余县扩兵2万余人。总计33万余人。其三，作为后勤供应的基地。一方面动员大量干部、民工、民兵随军支前，另一方面，提供大量军用物资，包括粮食、棉衣、军鞋、棉被、布袜等等。其四，作为干部输出的基地。从

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山西革命根据地共南下区级以上干部1万余名，连同南下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山西籍干部共2万余名。

（三）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基地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山西革命根据地首先推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组建新民主主义政权。主要措施有：村选的法制化，程序包括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公民登记、划分选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公开宣布选举结果等步骤。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再如“三三制”原则的实行。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组成上，要体现“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不左不右的中间人士各占1/3。其次，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山西革命根据地在长达12年中，拿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和战争物资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像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那样的几万人口的小县，能够常年供给一个正规团，依赖于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各项经济建设。减租减息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购买、佃入和赎回土地，购买耕畜、种子，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因为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农村劳力紧缺，农民创造了帮工互助的办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根据地成立生产运动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制定鼓励发展生产的各项政策，开展劳动生产竞赛，颁布奖励办法；召开群英会、劳模会；繁荣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农民生活，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事业上，文化工作者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的设施，“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各部门生产技术的改进，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等。不容否认，这是来自各地的技术人才、科学家、文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努力参加工作而取得的成绩。但文化工作者在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发挥积极的力量，这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

是由于根据地民主建设对于文化工作者的爱护与敬重。在学术上，倡导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讨论、自由著述等新鲜活泼的民主作风，并拟定而且通过各种创作发明等奖金，给予文化艺术工作者以有力的鼓舞，在精神上获得某些慰藉。由此可以证明，只有在民主革命根据地，才能更加充实发挥与发展新文化，而文化人也才能享受更高的民主权利。[①]

注释：

①陈默君：《纪念五四对文化工作的点滴感想与意见》，自《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14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三、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学思潮演进

（一）抗战初期山西革命根据地文学思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保家卫国，同野蛮残暴的日军进行的一场伟大而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山西抗日军民经过1939年一年的反围攻、反“扫荡”，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基本上结束了抗战初期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完全控制了晋绥之晋西北，晋察冀之北岳、冀中，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等广大地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体和文艺领导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协会（简称“文协”）成立，1939年2月15日，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边区文救会”），选举叶正莹、邵子南、周明、邓拓等11人为执行委员。以后，执委会推举刘平为主任

（兼任《抗敌报》副总编），叶正莹为副主任，并建立常设机构，出版综合性刊物《边区文化》。在边区文救会的领导下，各专门协会相继成立。1939年7月7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剧协分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称：“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运动，在粉碎敌人屡次的进攻，巩固与扩大边区的过程中，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号召“全边区的全国戏剧工作团体与戏剧工作者们，在抗战的战线上，握紧我们的武器，守住我们的岗位。”[①]会议推举抗敌剧社、西战团和战线剧社各派一名代表建立常设机构，选罗东为主任。1940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文协分会”）正式成立。到会代表50余人，成仿吾、沙可夫分别作报告，会议通过提案31条，主要有建立文学顾问委员会、鲁迅研究会、文艺流通图书馆，设立鲁迅文学奖等，决定每年评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奖，并成立编审委员会，出版各种文艺刊物、丛书。会议选举成仿吾、邓拓、田间、周而复、康濯等为执行委员，选举沙可夫、田间、魏巍、何洛、康濯5人为常委。会议还就边区的文艺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

1941年6月16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取代边区文救会。到会代表32人，推举成仿吾、常青、沙可夫、邓拓等15人为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创作活动、文艺批评、乡村艺术活动、出版工作、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问题。从此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8月，晋察冀边区基本形成。是年秋天，成立了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岳区党委。因晋察冀边区是以太行山为依托，晋东南又为边区的腹心地带，所以文化领导机构多建于晋东南，名称上也有“晋冀豫”、“晋东南”、“太行山”等互用的情况，实际上都是整个边区的领导组织。晋冀豫边区的文艺领导机构是先筹建各专门文艺协会，后才成立总领导机构的。1939年1月4日，边

区戏剧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的筹委会，推举朱光、李伯钊、赵品三、陈沂、张柏园及太行山剧团、大众剧团、火星剧团、决死一、三纵队剧团，联盟上党中心区抗日剧团11席为常委。朱德和薄一波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工作，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简称“剧协分会”）于2月28日在长治成立。参加会议的有边区67个大剧团的代表60余人，选举太行山剧团等13个单位为执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简称“文协分会”）于1939年11月28日在武乡下北漳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余人。会议选举李伯钊、何云、孙泱、刘白羽、王玉堂（冈夫）、陈荒煤、阮章竞（洪荒）、袁勃等14人为理事，李伯钊、蒋弼、孙泱、王玉堂、洪荒为常务理事，并分别在太南、太岳、太北等区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和出版文艺刊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是全国文协成立后在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分会组织。

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简称“文教总会”）经过4个月的筹备工作，于1939年5月4日在沁县南河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包括边区文化、教育界各党派团体及敌占区的名人文士。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文教总会的宣言、简章、工作纲领等。大会选举高沐鸿、史纪言、王振华、李棣华、崔斗辰、李伯钊及团体会员新华日报社（华北版）、民族革命通讯社（简称“民革社”）、胜利报社、剧协分会、青记分会等23席为执行委员。王振华、史纪言、王玉堂、高沐鸿及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为总会常委。大会制定了工作任务：一、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定持久抗战与增强保卫晋东南抗战必胜的信心。二、创造、提高与发展抗日的、民族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三、广泛开展宣传战，粉碎敌伪欺骗宣传。四、协助政府协同其他宣传教育出版机关，组织宣传出版委员会，推动、统一并巩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五、推动并协助各文化团体开展并充实工作。六、团结各地文化教育工作者，组织各地文化教育救国会（简称“文救会”）。七、普及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建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